

沈阳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

刘建华，周林，姜美微

(辽宁大学商学院, 110136)

摘要: 新中国成立初期依靠着战略优势、资源丰富极其历史背景等因素,在中央大力扶持的基础上辽宁迅速发展成为全中国的工业基地,沈阳市成为辽宁省工业的排头兵。但是由于集中发展重工业,导致高新技术企业所占比例过低,民营企业发展滞后,新兴产业尚未形成,结构性问题在经济新常态下日益突出。因此摆脱计划经济时代落后的重国有轻民营的思想观念,转变政府职能;调整传统产业结构,依靠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实现传统支柱产业的“再工业化”改造是沈阳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技术创新能力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一系列结构性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市场机制体制不合理、产品竞争能力不足及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导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沈阳市面临着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适逢2015年中央新一轮《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的政策支持,沈阳作为东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必将成为我国深化市场改革的主战场。根治性解决沈阳市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产品创新程度低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因此深度剖析沈阳市市场结构的症结所在并对症下药至关重要。

1. 沈阳市可持续发展面临困境

1.1 私营经济发展滞后

计划经济时代,作为国家重点投入发展城市,沈阳市形成了政府统一分配资源、统一生产、统一消费的模式,“铁饭碗”思维导致多数企业缺乏敏锐的市场判断与危机意识,企业创新与改革热情不足,创新意识淡薄、创新能力低下。同时,建国初期的政策倾斜导致老工业基地获取了大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大都运用到国有企业的建设中^[1]。而这种倾斜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对于国有企业的路径依赖,造成市场经济发展缓慢,政企不分。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加速,沈阳市对于产业布局进行了调整,私营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逐年上升(如表1所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逐年下降,但是同比于我国发达省会广州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仍然偏高(如表2所示)。私营企业难以突破资金密集型的国有企业壁垒,政府对于私营企业创新发展支持不足。而当国有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形成大量冗员时,整体经济缺乏吸纳就业与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能力,私营企业活力不足而导致社会总体劳动率偏低会造成一种经济环境的恶性循环。

* 本文为辽宁省社科联2015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2015lslktglx-03)、2015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重点L15AGL011)中期成果。

表 1 2010—2014 年沈阳市私营企业产值占比工业总产值

项目 \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私营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 (%)	44.81	45.17	49.48	49.18	49.25

表 2 2008—2014 年沈阳市与广州市国有企业产值占比工业总产值比较

项目 \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 (%)	沈阳	6.40	5.75	5.47	4.34	4.16	1.49
	广州	3.72	3.82	3.63	3.74	11.15	1.69

1.2 体制机制落后

200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沈阳市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以及经济结构。相反的是，依靠“国内投资拉动”以及倾斜于重工业的趋势反而越加严重，甚至近年来辽宁省经济出现了“断崖式”下跌，这种“新东北现象”的症结在于新常态背景下，加之传统优势重工业衰退和新兴产业尚未形成而导致东北地区经济、产业和国企等的结构性问题在快速变换的市场环境中愈加脆弱^{[2][3]}。这说明辽宁省的经济体制以及制度机理依旧存在问题，而沈阳市作为东北的政治中心，由政府主导安排的经济结构调整极其路径选择并不完全适应市场化竞争的需求、“大政府、小社会，强势政府、弱势市场”的问题尤为突出。如表 3 所示，沈阳市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大都来源于政府主导的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自筹资金。2012 年到 2014 年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入新常态，沈阳市利用外资的比例逐渐低于广州市且差距拉大。根据凯夫斯的市场结构传导效应理论，外资的进入会将资金拥有者国度的市场结构带入到东道国中，改善东道国的市场结构，而这种传导机制同时又会引发“鲶鱼效应”，促进市场的竞争，从而提高市场的竞争指数^[4]。沈阳市过分依赖国内资金而缺乏良好的外资引进机制导致市场结构不合理，市场指数同发达省会广州市相比偏低，且走势放缓（如图 1 所示）^[5]。

图 1 2010—2014 年沈阳市与广州市市场化指数对比



注：本文所有指标数据均根据《沈阳年鉴》（2009-2015）、《广州年鉴》（2009-2015）整理所得。

表 3 2010—2014 年沈阳市与广州市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比例

年份	沈阳市					广州市					
	国家 预算 内的 资金	国内 贷款	利 用 外 资	自 筹 资 金	其 他 资 金	国家 预算 内的 资金	国内 贷款	债 券	利 用 外 资	自 筹 资 金	其 他 资 金
2010	2.30	12.85	2.91	71.13	10.81	0.24	22.13	0.17	2.30	52.16	23.00
2011	2.84	13.37	2.72	66.10	14.97	0.18	15.58	0	2.47	54.62	27.15
2012	4.66	14.10	1.34	68.28	11.62	3.72	18.51	0	1.37	51.66	24.74
2013	5.23	10.25	2.48	69.32	12.72	3.77	16.47	0	4.24	49.16	26.36
2014	3.94	10.07	0.70	76.96	8.33	4.25	14.99	1.77	1.78	51.99	25.22

1.3 新型产业比例偏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沈阳市经济结构、组织结构以及产品结构未能相应做出适应性调整。第二产业比例仍然过高，第一产业尤其是依托于现代新型科技与信息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优势产品大多集中于机床、装备器械等传统装备制造业，这些产品具有严重的能源依赖性，过分集中生产导致产能过剩以及资源枯竭。受到重工业产业结构惯性发展的影响，以服务导向新兴产业比如 IT 业、咨询业、物流业等发展缓慢。沈阳市尚未形成完善的新兴产业体系很大程度上源于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高技术企业发展滞后而导致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这一点可以从高新技术产品情况窥见（如表 4 所示）。表中所示各项中沈阳市均远低于广州市，而高新技术产品实现利税这一项沈阳市仅为广州市的 1/2，可见沈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尚不成熟，创新能力不强，依靠高新技术产品获取收益偏低。当原支柱性产业不适应宏观经济发展需求时，依靠创新驱动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不足。

表 4 2010—2014 年沈阳市与广州市高新技术产品情况(单位：万元)

年份	沈阳市				广州市			
	总产值	增加值	销售 收入	实现 利税	总产值	增加值	销售 收入	实现 利税
2010	38900448	10302857	38285948	3302662	54742677	15943693	55139234	8872172
2011	46176888	12194576	45300211	3849059	64622379	18312952	60343843	8365602
2012	50265926	13898340	48731691	4368818	64580281	18064973	62966070	8634183
2013	56246665	16154075	53476188	4643602	75937364	19858179	73204852	10299181
2014	57574153	17170618	55240811	5167484	79948409	23071519	76196837	9196367

2. 沈阳老工业基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2.1 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新常态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实现政企、政事、政资、政社有效分离是经济新常态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着力完善审批制度改革有利于减少政府对于微观经济的干预，封锁“寻租”空间，提升市场运行效率。坚持问题导向，对那些确实束缚了经济发展但附加价值高的权利进行下发，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打破行政垄断，打破“铁门”、“玻璃门”和“弹簧门”，推动垄断行业向社会资本开放，投资结构与方向的转移要依靠价格的传导机制以及市场的竞争机制完成，建立有效的、公平的竞争机制，激发市场内部活力。列举“负面清单”，行政机关不能法外授权，要注重公平正义，降低民营资本进入市场的门槛，充分激活民企活力，发挥民营企业船小好调头的优势，融入老工业基地整体格局，为沈阳市经济复苏做出积极贡献。

2.2 依靠技术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坚定不移地落实自主创新精神，建立一套符合沈阳市老工业基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机制体制，完善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建立创新人才培养机制与激励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从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第一，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在优化传统重工业产品结构的基础上，依托于国家建立技术创新产业基地的政策优势，发挥技术创新的协同效应，过互联网信息等高技术形成新兴创新形式，改造传统产业；第二，大力发展低能耗、高清洁度、高技术含量的电子、IT、轻工等产业。促进服务性产业与传统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联动发展，赋予服务新内涵，实现两者融合，将产业链上下游向高附加值、高盈利行业拓展，增加产业链价值，充分发挥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正向促进作用^[6]。从供给侧着力，淘汰落后产能，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原则，制定出一套完善的政策体系，合理有序、适时适地的引导企业化解落后产能、淘汰过剩产能。第三，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等第三方中介机构按照既定体制下民营企业的发展要求展开工作，落实责任、规范行为，改善传统民营企业的发展模式进而形成新的发展模式。明确沈阳市民营企业发展重点方向，充分发挥区域与资源比较优势，形成高效运行、协同创新的民营企业产业网络。建立一种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合作共生关系，扩展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充分调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加速民营企业的发展动力。

2.3 企业应注重可持续发展，大力培育技术创新能力

企业是经济社会的重要细胞，经济可持续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往往依靠技术创新。第一，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培养良好的技术创新氛围；注重人才引进与培训，建立人才梯队，奠定夯实的技术创新基础；任人唯贤，合理使用，给予充分的技术创新空间；重视骨干人才，建立完善的绩效考核制度，可以采用依托于技术、知识、管理等要素进行项目承包，使用高薪聘用结合股权期权等激励机制，重视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收益的分配，使创新人才的收入与对企业的贡献真正挂钩。第二，注重绿色创新。以技术创新为基础，同时追求技术创新的工具效率以及把技术创新自觉融入到企业价值链中，使其成为一种价值理念，这种理念追求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注重社会效益与资源效率，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企业生产模式。第三，

转变经营理念。从战略高度认识到企业应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文化，并把这种文化当成是基础性工程，把可规范的显在价值观渗透到员工的信念、思想和价值观中去。员工要以积极心态参与到依托绿色技术创新驱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制定与实施中，建立一种生态化组织结构，内部协同发展，促进企业内部实现生态效益的可持续循环。

参考文献

- [1]蒋南平,黄方正.可持续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关键[J].社会科学,004,(10):42-45.
- [2]张占斌.经济新常态下的“新东北现象”辨析[J].人民论坛,2015,(08):14-17.
- [3]叶振宇.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态势与新一轮振兴[J].区域经济评论,2015,(06):61-67.
- [4]吴俊.外资进入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机理与对策[J].全国商情(经济研究),2008(05):88-89.
- [5]王小鲁,余静文,樊纲.中国市场化八年进程报告[R].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2016.
- [6]邓丽姝.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发展的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2):120-123.

作者简介:

刘建华,男,辽宁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知识管理。通讯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道义南大街58号辽宁大学商学院,邮编:110136,电话:13516003158,E-mail:271961264@qq.com;周林,男,辽宁大学商学院研究生;姜美微,女,辽宁大学商学院研究生。